

张同乐 著

HUABEI LUNXIANQU

RIWEI

ZHENGQUAN

YANJIU



# 华北沦陷区 日伪政权研究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 华北沦陷区 日伪政权研究

张同乐 著

Simplified Chinese Copyright © 2012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中文简体版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华北沦陷区日伪政权研究 / 张同乐著. —北京: 生活·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 2012.5

ISBN 978-7-108-03802-9

I. ①华… II. ①张… III. ①华北政务委员会—史料 IV. ① K265.63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73184 号

责任编辑 贾宝兰

封面设计 康健

责任印制 郝德华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邮 编 10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京海印刷厂

版 次 2012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  
2012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印张 17.375

字 数 300 千字

印 数 0,001—3,000 册

定 价 55.00 元

本书为 2004 年河北师范大学  
博士基金项目成果，并获得河北  
师范大学学术著作出版基金及河  
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强势学  
科项目的资助。

# 序

刘景泉

华北伪政权的产生与存在，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的特殊历史现象，很有必要从学理上探究和剖析。

华北伪政权主要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1937年12月14日—1940年3月29日）和“华北政务委员会”（1940年3月30日—1945年8月15日）两个时期。其统治中心为北平市，所辖区域大体包括河北、山东、山西、河南四省，北平、天津、青岛三个特别市。是抗战时期日本在沦陷区扶植的重要伪政权之一，成员多为北洋政府的失意政客。中国近代史上的政客作为权力欲驱使下的政治动物，无论得意还是失意，其目的只有一个：追逐更多的权力和私利。政客们大多没有明确的政治理想，心目中是非标准是虚无的，有的只是永恒的利益关系。陈独秀曾在《除三害》一文中评价说：“把这班政客烧成了灰，用五千倍的显微镜，也寻不出一粒为国为民的分子来。”梦想东山再起的失意政客更加阴毒，或纵横捭阖，党同伐异；或借助外力，卖国求荣。不管“东洋”“西洋”，由失意到失节，由卖身到卖国。这似乎演变成一个历史规律，华北伪政权的问世便是这种规律的再现而已。同乐这部著作的立意，便在于努力揭示这一中国近代历史上潜在的政治历史规律。

本书是同乐在其博士论文基础上修改而成的。其创新之处

在于：

第一，从中国政治史的层面，对华北伪政权的权力结构及其运作，军政要员的派系进行系统研究。“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形式上承袭了北京民国政府的“法统”，虽然按分权主义议会政治，设有行政、议政、司法三个委员会，但本质上是日本侵略军扶植的傀儡组织。“华北政务委员会”承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名义上隶属于汪伪国民政府，但实际上是在华北日军操控下行事。所谓“高度的自治”，以及具有“中国色彩”的行政权，只不过是蒙蔽视听自我粉饰。伪政权中的日本顾问才是真正的掌权者。华北伪政权的运作主要是通过法律规章、“中央”与地方的权力隶属关系、官吏选拔任用实现的。华北伪政权与维新政府及汪伪政府的纷争离合，王克敏与汪精卫、梁鸿志等不同区域和派系附敌者之间的勾心斗角与“合流”，折射出各部侵华日军之间的利益博弈。

第二，突破以往华北地方伪政权研究的地区分割状态，进行跨区域整体性探讨与研究。对华北沦陷省、道、县、特别市伪政权组织结构和施政举措的考察，一定意义上深化了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

第三，从社会关系、人际关系和文化认同心态等方面，深入探讨华北汉奸群体的复杂派系。用心态史学、社会学理论考量传统道义、人际关系在日军“以华制华”政策冲击下的畸形裂变和民族危机下不同群体的命运，剖析不同阶层附逆者出任伪职的原委与心态。依靠自上而下的官吏任命制度，以亲缘、地缘、学缘、业缘的“人际关系四边形”为主体，构筑起“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华北附逆者群体。

第四，从社会史的视角研究日伪在华北沦陷区的殖民统治，运用取自敌伪档案中的详实资料，实证日伪黑暗统治造成的诸多

社会问题和天灾人祸。如纵毒政策的推行，慰安妇的征用和输送，以及蝗灾救治中背离民意的“社会动员”，都给华北沦陷区社会带来深重的灾难。

第五，史学界对华北沦陷区的抗日活动的研究相对薄弱，同乐运用馆藏档案资料对国共两党地下组织和华北沦陷区民众的抗日活动做了较为详尽的探讨，论证了华北沦陷区的抗日斗争是中国抗日战争的有机组成部分。这在一个侧面丰富了中国抗日战争史的研究。

选择华北沦陷区伪政权这样前人研究相对不足的领域作为论题，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作者开拓新的研究领域的学术胆量和勇气。同乐这本书，是以北京市档案馆、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天津市档案馆、河北、山西、山东、河南等省档案馆的馆藏档案为主要资料依据写成的，有些档案资料当为首次公开使用。这些尘封多年的日伪档案记录下华北沦陷区的实态，同乐能够不辞辛劳奔波于华北诸省市搜集查阅，其间甘苦可以想象。运用大量馆藏日伪原始档案，论析华北沦陷区日伪政权的历史，“以子之矛攻子之盾”，这也是本书值得肯定之处。

数年前同乐在南开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我曾与他谈过，研究抗战时期的伪政权，编写一套研究日伪政权的系列著作，是很有意义的。同乐这本书的出版，使我感到欣慰。其实，我与同乐属于同一代人，学习生活中也是很好的朋友。在他的书即将出版之际，要我写几句话，推辞不掉只好奉命。

是为序。

2010年8月15日

于南开大学

# 前 言

## 一、问题的提出

华北伪政权是1937年平津沦陷后，日本侵略军在华北占领区扶植的傀儡政权。日伪政权与抗战时代的“奸”与“伪”，早已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的大肃奸过程中铁案审定，何以在21世纪的今日仍要翻阅尘封数十年的历史档案，搜寻众多的旧时报刊，考证史实，剖析研究呢？华北伪政权的产生与存在，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的特殊历史现象，需要从学理上探究和剖析。从政治体制、政权结构和政权运作的视角，对华北伪政权的历史进行深入系统的探讨，有助于深化抗日战争和华北沦陷区的研究。所有这些，促发我奔走于华北有关省市和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将研究聚焦于华北沦陷区日伪政权。

华北伪政权的统治，包括“中华民国临时政府”（1937年12月14日—1940年3月29日）和“华北政务委员会”（1940年3月30日—1945年8月15日）两个时期。其所辖区域大体包括河北、山东、山西、河南四省，北平、天津、青岛三个特别市。

“华北”既是一地区的称谓，又曾是大行政区名。本选题所涉及的“华北”是一特定的历史区域，其地域大致界定为：河



北、山西、山东、河南四省和北京、天津、青岛三市，即指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伪华北政务委员会的辖区范围。时段上界定为1937年至1945年。

华北是日伪统治、掠夺的“重灾区”，华北日伪政权是典型的傀儡政权。剖析华北日伪政权这个历史的脓疮，对于深入研究日本侵略华北的历史，揭露华北群奸为虎作伥、奴役统治华北人民的罪行，对于铭记国耻，激发爱国之志都有着重要的意义。对于回击一些西方学者的殖民主义观点，回击日本右翼歪曲日军侵华历史，也有着很强的现实意义。

本文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以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伪华北政务委员会的兴亡为主线，从政治史和政治制度层面，对华北伪政权的权力结构及其运作，军政要员的派系，华北沦陷区社会灾难与人民抗日斗争进行系统研究。梳理华北伪政权“中央”、省和特别市的政权架构、主要人事更替；伪政权本身的政治运作及其施政举措；透视日伪统治下的华北沦陷区社会；剖析华北伪政权的汉奸理论；揭露其充当日本帝国主义鹰犬、镇压华北人民抗日运动的罪行。同时，对日本帝国主义“以华治华”、“分治合作”的侵华策略作进一步剖析。

## 二、国内外研究概况

史学界对汪伪政权研究较多，对伪满洲国研究也有不少成果，华北伪政权的研究则相对薄弱。到目前为止，从政治和政治制度史层面，对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伪华北政务委员会进行系统研究的学术著作甚少，研究论文也不多。现将已有研究略作回顾与综述。

### （一）中国学者的研究

1939年10月1日毛泽东为延安解放社出版《日本帝国主义

在中国沦陷区》一书写了《研究沦陷区》的序言，对研究沦陷区的重要性、迫切性和重要意义作了深刻而明确的阐述。

毛泽东指出，中国沦陷区问题，“是日本帝国主义的生死问题”<sup>[1]</sup>，是“抗战第二阶段——敌我相持阶段的极端严重的问题”<sup>[2]</sup>。利用伪政权经营沦陷区，是日本帝国主义继续进行军事进攻的同时，更加注重政治进攻和经济进攻的主要策略手段和表现，因此，“沦陷区问题的研究是刻不容缓了”<sup>[3]</sup>。毛泽东还指出，在这个问题上，有敌人的一面与我们的一面，在我们的一面，“是如何支持游击战争的问题”；在敌人的一面，“是敌人在沦陷区已经干了些什么并将要怎样干”<sup>[4]</sup>。毛泽东特别指出：“研究这个问题，乃是研究前一问题的起点，不了解敌人的情形我们对付它的方法是无从说起的”<sup>[5]</sup>。毛泽东还强调，鉴于抗战干部中“十人而九”对这个问题“没有研究或没有系统研究”，“这就指明我们对于这个问题唤起注意的重要性与必要性了”<sup>[6]</sup>。在中共中央的倡导和支持下，延安时事问题研究会很快编辑出版了一套“时事问题丛书”，分为日本问题、沦陷区问题、国际问题、抗战的中国问题等几个方面。这套丛书出版后，对抗日根据地广大干部群众了解日伪的统治政策和罪行颇有助益。与此同时，抗日根据地以及国民政府统治区的各种报刊也加强了对沦陷区日伪统治状况的报道，揭露和抨击日伪在沦陷区的殖民统治罪行，激

---

[1] 毛泽东：《研究沦陷区》，延安时事问题研究会编：《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沦陷区》，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页。

[2] 同上。

[3] 同上书，第2页。

[4] 同上。

[5] 同上。

[6] 同上。

励民众的抗日斗志。可以说，从全国抗战爆发后不久，中国抗日区域有关部门对沦陷区、伪政权的研究即已开始，成为抗战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对当今认识和研究沦陷区问题仍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北京联合书店和上海大东书局于1951年分别出版了郭士杰的《日本侵华暴行录》和储华的《日寇的滔天罪行》。这两本书虽然只是一般的通俗历史读物，但书中触及华北沦陷区研究这一课题。作者对侵华日军在中国沦陷区的暴行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严正谴责，显示了新中国史学工作者强烈的社会责任感。随后又发表有关研究沦陷区的论文30余篇。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华北沦陷区的研究有了一定的进展。研究者在揭露侵华日军暴行的基础上，开始注意对日本侵华历史进行专题性的探讨。《山东大学学报》1961年第3期发表了吕明灼的论文《抗日战争时期日本帝国主义在华北所推行的“治安强化运动”》。这篇论文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研究华北沦陷区和华北伪政权的早期成果，带有一定的开拓性意义。在史料整理与出版方面，上海人民出版社于1958年翻印了延安时事问题研究会1939年编写的《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沦陷区》。该书汇集了有关华北沦陷区日伪政权的部分报刊文稿，为学术研究提供了一些初步的资料。总体上看，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有关华北沦陷区和伪政权的研究，主要是揭露日本侵华罪行，而且发表的有关研究成果带有明显的感情色彩。

自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中国大陆政治运动接踵而至，沦陷区和华北日伪政权研究成为学术“禁区”。因为在这个研究领域内，不少研究是针对日伪的，“而日伪政权、汉奸等早有权威定论，何须为民族败类树碑立传，加以研究？”再则，在当时

历史局限下，有关帝国主义侵华史的研究，被定性为写“挨打受气史”、“犯了方向性的严重错误”等等。随着“左”的思潮肆虐，有关沦陷区和伪政权研究基本陷于停顿。台湾地区学者在这一时期发表了少量有一定学术价值的论著。

文化大革命结束，特别是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华北沦陷区日伪政权研究得以恢复。历史档案资料的整理和出版逐年增多，到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出版的史料主要有：北京市档案馆选编的《日伪在北京地区的五次强化治安运动》上下（北京燕山出版社1987年9月版）、《日伪北京新民会》（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年12月版）。同时华北沦陷区和伪政权研究开始由单一揭露侵略罪行走向深入的学术探求；由感情色彩浓烈的批判向冷静的科学探讨过渡。论者试图摆脱感情的因素，在挖掘详实史料基础上，进行冷静的科学分析。正是这种“冷静”科学的治史精神，激励后人逐步摆脱“应景文章”或“标语口号式的骂倒作品”<sup>[1]</sup>，从更加注重维护世界永久和平的视角，审视过去，为不让那段屈辱的历史重演而不懈努力。在此阶段，日伪政权研究的主要成果还集中于伪满洲国和汪伪政权这两个课题，其他大量研究论题，或稍有涉及，或根本无人问津，发展很不平衡。“沦陷区研究显得单薄和沉闷……在现有的百余篇文章中，大多数仅仅停留于史实陈述，缺乏理论分析，有些甚至只是资料堆砌，实难称之为论文。更为突出的欠缺在于，有关建立沦陷区研究的理论体系问题没有引起充分的重视”<sup>[2]</sup>。这是当时研究水平不高的主要症结。

---

[1] 金光耀、张济顺：《抗日战争时期沦陷区研究述评》，载曾景忠编：《中华民国史研究述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6月版，第305页。

[2] 同上书，第320页。

20世纪90年代后，特别是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后，对华北沦陷区和伪政权的研究进入了新的学术探讨阶段。其突出特点是：史学工作者深入挖掘了大量原始档案资料，以实证的方法多层次地研究华北沦陷区和伪政权。其中资料性成果有：南开大学历史系、唐山市档案馆选编的《冀东日伪政权》（档案出版社1992年5月版），北京市档案馆、河北省档案馆选编的《日本侵华罪行实证》（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居之芬等选编的《日本对华北经济的掠夺和统制——华北沦陷区经济资料选编》（北京出版社1995年版），章伯锋、庄建平选编的《抗日战争·日伪政权与沦陷区》（四川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中央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合编的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中的《华北治安强化运动》（中华书局1997年12月版）、《华北大“扫荡”》（中华书局1997年12月版）、《华北事变》（中华书局2000年7月版）、《华北经济掠夺》（中华书局2004年10月版）、《汪伪政权》（中华书局2004年6月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选编的《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2编，附录2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9月版）。季啸风、沈友益主编的《中华民国史史料外编——前日本末次研究所情报资料》（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5月版），南京市档案馆编《审讯汪伪汉奸笔录》上下（凤凰出版社2004年4月版），中央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合编《日本侵略华北罪行档案》1—10册（河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8月版）等。

随着史料的发掘，出现了一批学术价值较高的论文和著作。如曾业英的《日本对华北沦陷区的金融控制与掠夺》（《抗日战争研究》1994年第1期）和《日伪统治下的华北农村经济》（《近代史研究》1998年第3期），居之芬的《日本对华北经济统治和

掠夺》(《历史研究》1995年第4期),费正、李作民、张家骥的《抗战时期的伪政权》(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7月版),朱德新的《20世纪三四十年代河南冀东保甲制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12月版),王桧林主编的《抗日战争史》丛书续编的有关分册中,也涉及华北伪政权研究,如冯崇义的《国魂,在国难中挣扎》(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12月版)。居之芬、张利民的《日本在华北经济统制掠夺史》(北京出版社1995年7月版),张洪祥主编的《近代日本在中国的殖民统治》(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10月版),谢忠厚等《日本侵略华北罪行史稿》(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9月版)。王强的《汉奸组织新民会》(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年8月版),余子道、曹振威、石原华、张云的《汪伪政权全史》上下(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12月版),刘敬忠的《华北日伪政权研究》(人民出版社2007年7月版),郭贵儒、张同乐、封汉章的《华北伪政权史稿》(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7月版),江沛的《日伪“治安强化运动”研究》(南开大学出版社2006年4月版),王士花的《日伪统治时期的华北农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9月版),《战时日军对山西社会生态之破坏》(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6月版)等。

从内容上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华北沦陷区和日伪政权的已有研究成果分别如下:

### 1. 关于日军和伪政权在华北沦陷区暴行的研究

论者主要集中于日伪在华北进行的“大扫荡”和五次“治安强化运动”。吕明灼的论文《抗日战争时期日本帝国主义在华北所推行的“治安强化运动”》(《山东大学学报》1961年第3期),使用《解放日报》、《实报》等报刊资料,首先对华北“治安强化运动”分阶段评析,接着从政治、思想、经济三个横断面加以

概述。认为，日伪在华北推行的“治安强化运动”，经过了“治安肃正”（仅限于政治）、“治安强化”（范围扩展到军事、经济等各个方面）、“新国民运动”（“治安强化”的回光返照，特别着重政治和思想文化）。“治安强化”集中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一切野蛮、卑鄙手段，“在华北绘涂了一幅率兽食人的血腥图画，在人类文明史上积下了最为可耻的一页。”<sup>[1]</sup>王国华的《从档案资料看日伪的五次治安强化运动》（《北京档案史料》1987年第3期），着重说明日军推行“治安强化”的基本方针是发挥华北伪政权的作用，以达到掌握“民心”，开发和掠夺经济资源的目的。由于中国抗日军民坚持抗日斗争，日军的“治安强化”运动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谢忠厚的《华北甲第一八五五细菌战部队之研究》（《抗日战争研究》2002年第1期）认为，“七七”事变后日军迅即组建起来的华北北支“甲”第一八五五部队，其本部隐蔽在北京城内，是侵华日军继七三一部队之后在中国建立的第二支细菌战部队。这支防疫给水——细菌战部队除其本部外，先后在天津、石家庄、张家口、济南、青岛、太原、郑州、开封、徐州、包头等16个城市设立了防疫给水——细菌战部队的分部，在野战师团配属了防疫给水——细菌战班，并与陆军病院配合行动。在北京和各地的细菌武器工厂中，使用数千名抗日军人和居民进行人体实验和活体解剖；在华北战场上，以极其隐蔽的方法大量使用细菌武器，并与“三光”政策相结合，残忍之极，仅1943年日军在鲁西使用霍乱菌作战，就致使中国军民死亡20万人以上。徐勇的《侵华日军驻北平及华北各地细菌部队研究概论》（《抗日战争研究》2002年第1期）认为，日军驻

---

[1] 吕明灼：《抗日战争时期日本帝国主义在华北所推行的“治安强化运动”》，《山东大学学报》1961年第3期。

北平甲一八五五部队及其分部是一支反人道、反国际法的，担负研制、生产与使用细菌武器作战任务的侵略部队。在战败投降后的两个月内，日军充分利用北平地区行政过渡与力量真空状态，彻底疏散其人员，充分销毁其罪证。20世纪50年代和90年代中日双方学术与社会各界对其揭露与研究出现高潮，有关甲一八五五部队的资料发掘与研究论著等方面，均取得阶段性的成果，其设置、活动、性质及其“活体解剖”等罪行已经被学术与社会各界确认。但与七三一部队研究的丰富成果相比较，甲一八五五部队研究还显单薄。张同乐的《1940年代前期的华北蝗灾与社会动员》（《抗日战争研究》2008年第1期）以1940年华北蝗灾为背景，叙述和对比了晋冀鲁豫、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与沦陷区对应蝗灾的情况，认为：不同政权控制区的治蝗与社会动员方式上的不同，导致不同的效果；蝗灾监控与治理检验中不同政府的管理状况，一定意义上折射出民心的向背和政权兴衰。抗日根据地大规模的群众性治蝗运动，预示着中国救灾体制正由传统向现代转型。

另外，研究日伪政权在华北暴行的成果还有：中央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吉林省社会科学院主编的《华北历次大惨案》（中华书局1995年5月版）、李秉新主编的《侵华日军暴行总录》（河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何天义主编的《华北劳工协会罪恶史》（新华出版社1995年版）、何天义主编的《石家庄集中营》（新华出版社1995年版）、何天义主编的《中国劳工在日本》（新华出版社1995年版）、陈平的《千里“无人区”》（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年版）。江沛著《日伪“治安强化运动研究”》（南开大学出版社2006年4月版）。中共河北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长城线上千里无人区》1—5卷（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6月版）。谢忠厚主编的《日本侵略华北罪行史稿》（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9月版），并由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资料《日本侵略



《华北罪行档案》1—10册，分为：损失调查、战犯供述、大屠杀、无人区、细菌战、毒气战、集中营、奴役劳工、性暴力、文化侵略等专题资料。系统地揭露与研究了日本军国主义侵略华北地区的罪行及战后遗留问题。该书把日本侵略华北罪行，作为日本侵华史和中日关系史的一个典型来考察，运用新挖掘的档案文献和调查资料，从历史、现实与未来发展的角度，来阐述日本侵略华北的历史，分析其特点，论证其罪行、罪责，揭示其亟待解决的遗留问题。居之芬、庄建平主编《日本掠夺华北强制劳工档案史料集》上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该书汇集了侵华日军和伪军关押战俘和被抓捕平民的劳工集中营的历史资料，其中对比较大的石门（今河北省石家庄市）劳工集中营、天津塘沽劳工集中营、山东省济南新华院、北平劳工集中营（西苑）等有较多反映。[台]李恩涵的《日军在山东的“扫荡战”与“三光作战”（1937—1945）》（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24期下册，1995年6月）。秦孝仪主编的《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6编，傀儡组织（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1—1985年出版发行）。李恩涵的《战时日本贩毒与“三光政策”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12月版）。涉及日军在华北暴行的综合性著作有：魏宏运主编的《民国史纪事本末》1—7卷（吉林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王桧林主编的《中国抗日战争全书》（山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等。

## 2. 关于华北伪政权建立到解体的研究

20世纪60年代初已有数篇论文探讨华北伪政权的历史，80年代以后，对华北伪政权的研究呈现出侧重“中央”伪政权和注重地方基层日伪政权结构研究两种走向。对华北伪政权与侵华日军以及与其他日伪政权的关系，也有一些研究。这些成果中有一些是亲历者或部分亲历者带有回忆性质的研究。